

# Financing life

## 管理好你篮子里的财富

◎长河

### 财富可能“蒸发”

财富会在一夜“蒸发”吗?毫无疑问,有时会的。

如果你是一个美国的投资者,或者你买美国公司的股票,那么,在这样的日子里:1893年、1907年、1929年、1962年、1987年、2001年,你就会体会到财富是怎样“蒸发”掉的。在那些日子里——比如人们所说的“黑色星期五”——股票的价格从天上掉到地上,其价值等同于一张白纸,财富确实“蒸发”了,即使是那些人们认为稳如泰山的财富。而且,每一次股市的暴跌,总会有一批人从股市上消失——有的破产了,一蹶不振,或者干脆从高楼向下作自由落体运动。

在1949年之后的相当长的日子里,响应政府号召,支援国家建设”,把钱存于银行,或者买点国库券,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理财办法——如果这些行为能说是“理财”的话。因为有政府的信誉作保证,这样的行为几乎没有风险。

这并不是一件好事。人们很快就为自己的风险意识淡薄而付出代价了。在过去的20多年里,非法集资一直像一个幽灵一样,阴魂不散。有兴趣的人,不妨去翻看那些已经发黄的报纸——那里有很多人终生都挥之不去的噩梦。在这所有的非法集资案里,“高息”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字眼。所有的非法集资案都以“高息”为诱饵,但绝口不提“风险”。

但事实上,任何的理财行为,都伴随着风险。而且,一般来说,收益和风险成正比。这里试以银行储蓄、政府债券和股票等几种为例来说明。

一般来说,银行储蓄几乎没有什么风险。在美国这样的国家,银行存款有安全保障——即使银行破产了,政府通过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也将为10万美元以下的银行存款提供保障。在中国,大的银行都是国家所有的,因此,只要国家还在,存款就不会消失。但是,银行存款的收益是很低的,有的国家,比如日本,甚至存款没有利息。而且,如果有通货膨胀的情况发生,并且通货膨胀率比银行的利息高,那么,存在银行的钱不但不能增加,反而是在缩水。

和银行的储蓄相比,政府债券的收益要高一点,由于它是由政府的信誉作担保,所以,风险极小。但是,它的缺点在于,需要在一定的时间才能获得收益——政府债券通常是有期限的:一年期的、三年期的、五年期的,不一而足。如果要在兑付利息的日期到来之前把钱拿回来,其收益就会大大降低。

和上面的两种投资行为相比,股票更为难测——其风险更大,而收益也更大。但是,股市从来就是变幻莫测的。公司可以盈利,有时也可能赔本;价格有涨也有跌。这一切,同样是每一个投资股票的人必须承担的。

除了上述的投资行为,其他的投资行为,比如“炒”期货,购买共同基金,或者进行艺术品投资,都有一个风险和收益的问题。

如果投资失败,财富是可以“蒸发”掉的;这就是理财中必然会面对的风险问题。

### 看管“鸡蛋”的办法

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财富?这是一个无数人思考过的问题,而且是在和将来还会有无数人去思考的问题。答案似乎是有了,但是,好像永远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让大家遵照执行。

在谈到这个问题时,人们喜欢拿鸡蛋打比方。这是一个聪明人想出来的比方。财富和鸡蛋有很多相同的重要特点:首先,财富可以产生更多的财富;鸡蛋可以变成小鸡,然后再变成母鸡,然后会有更多的鸡蛋;其次,它们都是易碎的,处理不当——投资错误或鸡蛋掉到地上——很容易就没了;还有,它们旁边都应写有一块警示牌:小心轻放。那么,我们该如何看管这些鸡蛋呢?

可能的办法有很多,但下面的办法不能不提:

第一种办法,把它交给专业的孵小鸡的人。一个专业的人——专家将在社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——可信度比较高,可能会比我们自己去来看管的效果要好得多,重要的是,我们从此可以不再为它们操心。

但是,

这种办法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:那个专业的人是否会看管好鸡蛋?答案应当是:很难说。在看管好鸡蛋这个问题上,专业人士一定会做得更好吗?没人敢肯定——任何理直气壮“拍胸脯”的人,一定是疯了,或者是在骗人。

而且,对别人的鸡蛋,他会如此上心吗?须知,长在别人脸上的青春痘,自己又怎么会那样尽心尽力的去关心?

第二种办法是,自己看管好这些鸡蛋。因为是自己的鸡蛋,所以,自己会尽全力去看管它们。而且,如果鸡蛋碎了,那也只能怪自己。

在权衡利弊之后,很多人都会选择第二种办法。如果选择第二种办法,那么,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:是将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呢,是把鸡蛋分别放在几个篮子里呢?

一种人的做法是:把鸡蛋放在几个篮子里。这样,即使一个篮子里的鸡蛋碎了,其他的鸡蛋或许可能不会打碎。

另一种人的做法是:把所有的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,然后看好它。到底哪一种做法更好呢?

### 风险因人而异

我们可以控制风险,把风险控制在一个我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。

一些金融学的老师这样告诫自己的学生:你有风险的部分,永远不要超过你总资产的25%。应当承认,这是一个聪明的办法,毕竟,一个悬崖有一里远的人,是不会掉下去的。

但控制风险远远没有这么简单。事实上,每个人对风险都有自己的理解。举个例子来说,一个25岁的年轻人,手头有1万块钱,而一个已经退休的老人,也有1万块钱,如果要投资,他们会作出同样的决定吗?

一般认为,年轻人是一个激进的投资者,他可能会选择购买股票这样风险较大的“激进”行动,而那个已经退休的老人,则会选择一种比较“保险”的投资办法,比如说,把钱存入银行或购买政府债券。

也就是说,风险,对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你能够忍受,那么,这个风险对你来说,就已经不再是一个风险。举个例子来说,一个人需要借给别人5000元钱,而且,这个人是有风险的。如果这个人年收入只有几万元的工薪阶层,那么,他肯定会犹豫再三。如果这个人属于年收入过百万的高收入阶层,那么,他可能不会犹豫。一句话,风险因人而异。

### 一个“次优”的选择

风险虽然因人而异,但人们控制风险时,还是会采取大致相似的的办法的。

人们总是希望自己的财富能以



### 守坡待车

◎霍寿喜

最快的速度增长,但同时希望其风险最小,这是一种正常的心理。正像人们总是希望以最低的价钱买到最好的商品一样。

这是一个“最优”的结果。但是,这种结果是如何产生的?我们到哪里去找这样的方案?方案哪里有的?没有人能回答这样的问题。因此,它是一个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的“极限”。

所以,人们通常会寻求一种“次优”的结果。这种“次优”的结果,就是获得合理的利益回报,而不是超额利润。

一些经济学的研究表明,一个成熟行业的投资回报是8~15%。如果低于这个范围,那么,可能会有令人沮丧的结果;如果高于这个范围,那么,也要保持警惕。因为这个利润会很快吸引其他的进入者,从而导致行业利润的下降,甚至会导致全行业的破产。

在投资上,有投资和投机之分。投资所获的收益相对有限,但其风险较小,而投机可能会获得非常高的回报,但其风险也极大。

一般来说,希望获得合理收益的人,可以称为投资者,而那些想获得超额利润的人,则被称为投机者。这两种人构成了投资者的全部。当然,理智的人会选择大部分投资而小部分投机的办法。

这正是一个“次优”的选择。如果用“帕累托最优法则”(即80/20效率法则)来表述,那就是,把你全部资产的80%用来投资,而把其他的20%用来投机。

现在,我们可以回答上面的那个关于鸡蛋的问题了:如果你能承担失去所有鸡蛋的损失,那么,就把它们放到一个篮子里吧,但记住要看好它们;如果你不能承担损失所有鸡蛋的后果,那么,把它们分开放到几个篮子里去吧,记住一定要检查一下是否确实放好了。

救命稻草,示意帮他推一推车。

我和表哥便奔到车的侧后方,一左一右,同时使力,车子一下就冲上了坡。在平坦之处,车子停了,司机下来了,手里还拿着十块钱,说是“一点小意思,表表谢意”。表哥先是推辞,在我的劝说下,他才憨厚地接下了。

我突然生出一个想法:小城是个山城,坡路不知道有多少,在这样的雪天里,不知有多少车辆瘫痪在坡路中,为什么不能让表哥组织一些人“守坡待车”呢?表哥听完我的这个“创意”,高兴得叫了起来:肯定会等到生意!我再也不为吃住花费犯愁喽!”说罢,就掏出手机,召集他的民工伙伴……

傍晚的时候,我就接到表哥的“喜报”,说短短三个小时,他和同伴就做成二十多笔“推雪生意”,收入达300多块。我提醒他:“可不能趁雪打劫”哟,收费不要太高。”表哥兴奋地说:“几乎都是司机主动给钱,我们有时还假装推辞哩……”



### 免房租

◎李开周

苏轼写信给朋友程正辅:本州管六头项兵,却一半无营房,其间有营房者,皆两人住一间,颇不聊生。其余只在民间赁屋散住,每月出赁房钱百五十至三百。其间赁屋者,即于月粮钱内刻。《苏轼集补遗》尺牍四百九十三首,与程正辅四十七首之十)

这段文字说明三点:

一、当时营房紧张,军人有租赁民房的,也有租赁公房的;  
二、不管是租赁民房还是租赁公房,都要交房租;  
三、房租每月结算一次。

与苏轼同一时代,比苏轼大三十岁的另一宋朝文人江休复,转述一京官的话:

任京有两般日月。望月初请料钱,觉日月长;到月终供房钱,觉日月短。(《江休复:《江邻叟杂志》)这段文字说明两点:

一、当时住房自有率不高,某干部也是通过租房来解决居

住问题;  
二、该干部月初领工资,月末交房租,其房租也是每月结算一次。

至于这位干部租的是公房还是民房,从文字里看得出来。包括他每月交多少房租,咱们也无从得知。不过听他语气,房租负担似乎不低,要不然也不会每月底就赚日月短了。

五代末、北宋初,湖北安陆有一郑建中先生,家藏万贯,房舍众多,安陆城中大半居民都是他的房客,每月交给他的房租都可以买下几个当铺再加几千亩地。换言之,这位郑先生是个大房东。就我个人所知,在整个帝制时代,还没有哪个房东能在租房规模上超过郑建中的,除了政府——历代政府永远是最大的房东,它们手中握有大量公房,依靠公房租金来补贴财政收入。

郑建中心善,每年隆冬苦寒,蠲舍缗仍两月”(任得臣:《曝史》)。蠲”是免除,舍缗”是房

租,郑房东每年免除两个月的房租,算是给房客们减轻了经济负担,苏轼麾下的士兵和江休复提到的那位京官没能租到他的房子,应该感到遗憾。

政府心也善。在南宋都城杭州,租赁公房的房客一度超过十万



人,每逢水灾旱灾或者皇太后生日,朝廷都会减免房租。碰上皇帝心情好,房客们租一年房子也不用交一文钱。(参见《武林旧事》卷6,《驛民》)苏轼麾下的士兵和江休复提到的那位京官没能南宋都城租房,也应该感到遗憾。

但认死理的才是读书人,布鲁诺坚持日心说,认死理;马寅初坚持控制人口,认死理;谈家桢坚持孟德尔的遗传学说,认死理;中国古代的史官们不畏强暴,秉笔直书,弄得君主都有所顾忌,还是认死理。可怕的是,读书人的心眼儿越来越活,越来越奸,都不认死理了。

再回头说说,救市的事儿,有人不赞成救市,大意是中国没有出问题,中国金融也没有出问题,不该救也不必救。

好比大楼里谣传着火了,于是人们惊恐地四处乱跑,随时可能发生拥挤踩踏,难道因为没真着火就可以不采取措施?如果不采取措施,安抚人心,又会出现什么后果呢?

学者们不会不记得1929年的大崩盘吧。当时的胡佛总统就没有采取什么措施,不知是因为优柔寡断,还是没有足够的重视,总之,当恐慌已经形成的时候,没有什么能够阻挡。终于等到罗斯福实施新政,暂停股市交易,暂停银行营业。可是黄花菜都凉了,要不是二战,美国还要恐慌下去吧?怎么谈到中国的问题时,就把美国的教训忘了?

要笔者看,熊市不好。要不是熊市,中国石油能在香港一块多港币发行么?仁核桃俩枣就卖了;还有银行股们,让外资赚得盆盈钵满。如今在国内高价融资了,当初咋不多卖俩钱儿呢?静下心来,好多事儿还是能想明白的。

效果、公正与民生

■财富漫谈

## 效果、公正与民生

◎张晓晖

股市暴跌中,北大某教授发了一番宏论,我坚决反对用下调印花税来激活股市。印花税本身对股市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……股民希望政府用政策来救市,政府应该是很难兼顾的……一般的中小投资者自己要学会保护自己,就是你能玩得起就玩,玩不起的人怎么能让政府来保护呢?”

印花税无法激活股市,我也认为有一定的道理。好比说,咱开了一家馆子,免费停车,是不是就能顾客盈门呢?还是要看烹调的水平,要是饺子煮出来整个儿一个片儿汤余丸子,淮扬菜吃出了麻婆豆腐的味道,再免费停车也没用;反之,菜做出了水平,那就成了私房菜,大清朝最牛的私房菜要提前三个月预订,就是亲王贝勒也得规规矩矩排队。菜做到了这个份儿上,就是给客人矮板凳坐,他也得老老实实地蘸在那儿吃,牛嘛!

所以,印花税对于制止下跌的意义不大,不能说完全没有,但的确不大,场外的资金不会因为降税就入市,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了。

但是,市场为什么会出出现降低印花税的呼声呢?因为,印花税妨碍了市场的公平。想想看,2007年上市公司的利润总和不到6000亿,真正归属流通股股东的也就是2000亿,印花税就收了2005亿,再加上佣金,大约要接近4000亿。也就是说,上市公司的利润被“漏光”了,而券商的佣金是包含了人力、物力、财力等各项成本支出的,即便如此,券商为了争取客户不得不把佣金价格战打到几乎吐血的程度。而千分之三的印花税水平在世界上是很高的。

所以,印花税是否调整涉及一个公平的问题,这已经是公认的了,现在无非是在等待一个时机而已。

让人奇怪的是,该学者回避开印花税该不该调整的公平问题不谈,而斤斤计较于印花税调整是否有效,就算没有任何效果,难道就不该调整么?

至于说,玩儿得起如何,玩儿不起又如何的话,就更近乎蛮横而强词夺理。按照这种逻辑,我们还可以这样做:

把养路费提到每月一万块,玩儿得起车就玩儿,玩儿不起车就不要玩儿,没有人强制你买车;

把卖早点的税收涨上去,干得起就干,干不起你可以干别的,没人强制你一定要卖早点;

学费,学费也可以涨上去,上得起学就上,上不起学就不要上,没人强制你一定要受高等教育。

如果按照这个思路,汽车厂的东西卖给谁呢?汽车厂的工人、周围大大小小的配套工厂和作坊怎么活呢?

卖早点者何以谋生?吃早点的咋办?按照这个逻辑,所有的小买卖最后肯定都会因为被课以重费而难以为继。

事实上,正是因为高企的税费再加上城管暴力,近几年来,我国个体经济者平均每年减少八十七万,这是什么?是就业,更是民生呀。

穷人还受不受教育?曾有一些经济学家强调高校应该高收费,然后拿出来作为奖学金资助贫困生。但问题是,难道穷人必须优秀才能拿到奖学金的水平才可以受高等教育?这样是否公平?如果按照这个逻辑,连低保都可以取消,谁让你不够优秀呢?何况,如何保证手里的钞票能够真正变成资助贫困生的奖学金呢?巨额的社保还不是被人挪用了?不是有人开着奔驰去领低保么?

荒诞而荒唐的逻辑!

记得上学时,有一句嘲讽哲学家的话,我干吗要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?我只要知道它应该是什么样子就行了”。现在想起来,这样的哲学家才是真正的哲学家,如果世界不是“应该”的样子,他就不干。而而今从“应该如何如何”的角度去探究问题的读书人越来越少了,读书人越来越聪明了,也越来越实际了。

想起了吴宓教授,在西南联大教书的时候,此公上街闲逛,见某饭馆匾额居然大书“儒湘馆”,吴宓教授大概是林黛玉的崇拜者,于是上前挥杖打碎匾额,并在饭馆门前大骂,当时引来声援无数。这个读书人,太认死理了。

但认死理的才是读书人,布鲁诺坚持日心说,认死理;马寅初坚持控制人口,认死理;谈家桢坚持孟德尔的遗传学说,认死理;中国古代的史官们不畏强暴,秉笔直书,弄得君主都有所顾忌,还是认死理。可怕的是,读书人的心眼儿越来越活,越来越奸,都不认死理了。

再回头说说,救市的事儿,有人不赞成救市,大意是中国没有出问题,中国金融也没有出问题,不该救也不必救。

好比大楼里谣传着火了,于是人们惊恐地四处乱跑,随时可能发生拥挤踩踏,难道因为没真着火就可以不采取措施?如果不采取措施,安抚人心,又会出现什么后果呢?

学者们不会不记得1929年的大崩盘吧。当时的胡佛总统就没有采取什么措施,不知是因为优柔寡断,还是没有足够的重视,总之,当恐慌已经形成的时候,没有什么能够阻挡。终于等到罗斯福实施新政,暂停股市交易,暂停银行营业。可是黄花菜都凉了,要不是二战,美国还要恐慌下去吧?怎么谈到中国的问题时,就把美国的教训忘了?

要笔者看,熊市不好。要不是熊市,中国石油能在香港一块多港币发行么?仁核桃俩枣就卖了;还有银行股们,让外资赚得盆盈钵满。如今在国内高价融资了,当初咋不多卖俩钱儿呢?静下心来,好多事儿还是能想明白的。